

斯皮瓦克與女性主義批評

●張京媛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圖 這是一個厲害的女人！——佳姬特麗·斯皮瓦克。



其人其文

提起佳姬特麗·C·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人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是一個厲害的女人！」同斯皮瓦克接觸過或聽過她講演和辯論的人往往被她的機智和犀利的舌鋒所震住，甚至連介紹她的會議主持人也有時顯得心驚膽戰，生怕不慎口誤讓斯皮瓦克

捉住舌槍唇箭地擊打一番。斯皮瓦克何許人也？她是文學批評界的「怪傑」，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和文學理論家之一，周遊過世界上許多國家，進行公開的學術講

演和辯論。她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心理分析學、歷史編纂學的運用和批判是十分有名的，而且廣泛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斯皮瓦克於40年代出生於印度的加爾各答的貴族家庭，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爾各答大學英文系。1961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系讀博士學位，師承於保爾·德·曼（Paul de Man）。60年代末起開始在美國教書，現任匹茲堡大學英文與文化研究系的講座教授。她本人所出的專著並不多，只有發表了的評論葉芝（W.B. Yeats）的博士論文《「我需重建我自己」：葉芝的生平與詩歌》（1974），以及《在其他世界裏：文化政治論文》（1987）和《後殖民地的批評家：會談、策略、對話》（1990）。她翻譯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語法學》（*Of Grammatology*）（1976），與阿娜季克·顧哈（Ranjik Guha）合作編輯了《臣屬研究選輯》（1988）。斯皮瓦克擅長寫短篇評論，發表了許多很有影響的論文，一些論文已經成為「新經典著作」出現在研究生課程的必讀書目裏了。

「大理論」的移心運用

斯皮瓦克是女性主義者。一些女性主義者的文學批評基點是自己作為女性、母親、作家的經驗，並把這種個人經驗同「廣大」的、抽象的「婦女」經驗結合起來，讓「女」讀者覺得女批評家說出了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引起「共鳴」。她們高歌

「反美學」、「反理性」，頌揚女性理性就是她的生命感覺，把理論歸為男性的領域。斯皮瓦克卻拒絕這樣做。她認為這正中父權社會的詭計，因為非勒斯中心一直把婦女界定為充滿情感的非理性載體。斯皮瓦克在她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不僅使用着十分龐雜的「大理論」——馬克思主義、解構主義、心理分析學等等，而且經常有意把它們混摻在一起，同時她又不忌諱加入女性主義批評中的個人經驗。她可以在一篇文章中放入許多種理論：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論、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生產和再生產的家庭模式的女性主義觀點、後結構主義，使它們衝突，顯示出理論本身的危機，因而引起讀者的思索。她使用的是一種移心的話語（decentered discourse），但偶爾她的橫向思維太發達了，讓讀者感到無所適從，惶惑不止。斯皮瓦克曾經形容自己是「務實的解構主義的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a practical deconstructivist feminist Marxist”，*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頁133）。馬克思主義是觀察資本如何操作的綱領，女性主義研究主體理論——女人與男人作為主體的發展——同時也研究界定性別差異的社會實踐。女性主義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抽象和高度理論化，這兩者的綱領不能共同運作，雖然它們之間有聯繫。解構主義只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一種方法，它遠遠不如前兩者那樣內容充實，更像觀察事物的方法，而不像具體實踐的綱領。但是解構主義從另一種意義上也



圖 讀者很難用自己所習慣的閱讀歸類範疇來「套住」斯皮瓦克的文章，很難理解一個文學批評家為甚麼要在她的文章中大量地使用經濟學理論，大講特講學術界的微觀政治同帝國主義宏觀敘事模式的關係。

是實踐：解構主義觀察我們實踐時所使用的方法從而使觀察的方法變成實踐。我們知道，解構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三者之間存在着一些互不兼容的性質。同時採取這三種批評勢必引起危機。連斯皮瓦克自己也承認她的立場常常不為「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解構主義者所認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她太怪僻，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太認同男性，解構主義者認為她有太多政治意識，而本土理論家又認為她太傾向於西方理論。

本文與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的聯繫

斯皮瓦克運用高級理論為自己的女性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目的服務。斯皮瓦克的文章很難讀懂，有兩層困難度：第一層是她對在現有的話語之內的世界進行批評和反思時所難免遇到的困難，不管我們怎樣想明確地交流思想和理解自己，我們缺乏能足夠表達自己的專用語言。斯皮瓦克試圖說出一些我

們面臨的最迫切的困難，而這些問題尚未被人們所認識到，她的著作在這種意義上說是難以閱讀的。另一層困難是斯皮瓦克不按照學術領域中制定好的規則來進行批評運作，她侵越人類學、歷史學、哲學、文學批評、社會學的正式領域分界，混淆非正式分工的批評領域，例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解構主義。讀者很難用自己所習慣的閱讀歸類範疇來「套住」斯皮瓦克的文章，很難理解一個文學批評家為甚麼要在她的文章中大量地使用經濟學理論，大講特講學術界的微觀政治同帝國主義宏觀敘事模式的關係。斯皮瓦克這樣做是因為她相信本文與世界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有的人都像讀書一樣地來閱讀生活和周圍的世界，甚至那些「文盲」也一樣。世界實際上以文學的多層次、無固定的錯綜和公開性來書寫自己。通過對文學的研究，我們可以懂得和教授別人如何適當地閱讀世界和吸取教訓。單純的文學研究不能夠達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把文學形式的研究同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相結合。文學本文需要同別的寫作聯繫起來，批評者需要保持「批判意識」。這種批判意識持懷疑態度，警惕自身的局限性，重視學術寫作的社會和政治涵義。政治、歷史、哲學、文學批評都是用語言表達的，當解構主義者說「只有本文才存在」時，他們在討論一個由政治、心理、性別、社會等組成的網狀結構。只要你一張口說出某一事物的名字，就跌入比它更廣泛的網絡之中。

兩性「平等」與「差異」的本質論弔詭

女性主義批評也是處於密密編織的社會網中的。由於長期受男性的壓迫，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本質論的女性，不是強調女人與男人的平等便是強調女人與男人之間的差異。然而當「平等」和「差異」這兩個概念作為一對放在一起時，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很困難，因為如果我們贊同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那麼我們則被迫接受「差異」是平等的對立面；如果我們選擇了「差異」，我們就等於承認「平等」是不可達到的。197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批評主要是「平等」與「差異」的爭論。「平等」的口號可以從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中體現出來：「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可以做的事女同志也一樣可以做。」而1978年以後，「還我女人身」的口號則是由於強調女人與男人不同的結果。「平等」是社會術語，表明男女在各方面的平等；「差異」則往往指男女生理上的差異。強調「平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存在一個受男性壓制的領域，認為在男性統治中可以找到並建立不同的、更美好的社會的方法論和價值觀。強調「差異」的女性主義者主張完全同菲勒斯中心決裂，進入一個同男性傳統對立的文化中。斯皮瓦克反對本質論的方法是解構主義的。解構主義認為沒有任何定義是獨立存在的，要界定某一詞，必須首先把它同別的詞區別開，因此這個詞的定義永遠是延擱的。斯皮瓦克認為「女人」同其他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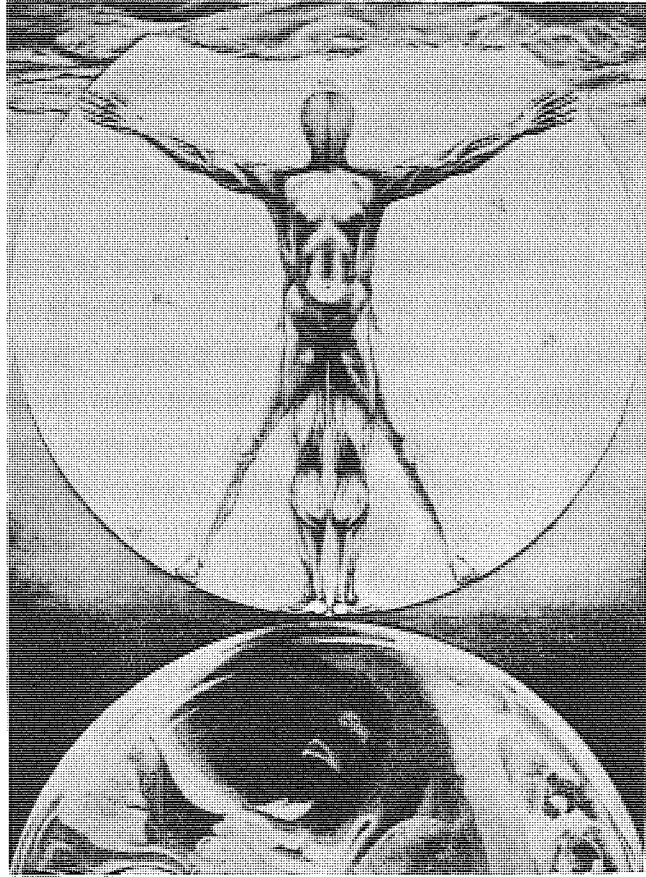


圖 分析所謂男性中心與女性邊緣不是要顛覆邊緣與中心的位置，而是要辨別兩者之間的錯位。

語一樣，只是在一系列的區分中才得到自己的意義的，「女」與「男」相互倚賴，沒有一項可以獨立存在，二者在相對的關係裏和他們所隸屬的能指鏈中獲得自己的定義。「女人」主要是同「男人」的區分，同「男人」相對照時獲得臨時定義的一個位置。我們可以一直解構男女之間的對立，最終顯示出錯位的二元對立。斯皮瓦克是解構主義者，不願強化二元對立的結構，但是她又認為必須界定「女人」，以便我們選擇自己的立場。因此她提出這個暫時的和有爭議的「女人」由「男人」一詞來界定的主張。孤立地討論「差異」與「平等」的作法往往只是抓住了問題的表象，我們應該通過檢驗甚麼構成法律和政治概念的「平等」與

「差異」，來分析產生「平等」和「差異」的思想體系和它背後的整個政治結構和社會制度。

「公」「私」錯位

傳統的文化闡釋把政治、社會、職業、經濟和知識領域劃為公界（the public sector），而把情感、性慾和家庭劃為私界（the private sector）。某些宗教、心理療法和藝術的實踐在廣義上來說也屬於私界，但是宗教機構、心理療法機構、藝術機構和藝術批評機構卻屬於公界。公界與私界時常是相互滲透的。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歐洲的女性主義實踐就指出公界的每一個

部分同樣也按照情感和性別來操作，家庭領域不是情感唯一的合法場所。婦女運動經常堅持要顛倒公界與私界的等級制度，因為人們一般認為公界比私界更為重要、更富有理性、更富有男性味道。但女性主義為顛覆公界和私界的等級制度而採取的方式是矯枉過正的，它堅持性慾和情感在事實上更為重要。如果所謂公界的成分是與私界中的成分糾纏混雜在一起的話，那麼私界的界定則帶有公界的痕迹和潛力，因為私界構成公界活動的一部分。這樣，公界和私界的對立不僅僅被顛倒，而且也得到了錯位。所有女性主義活動均在試圖解構私界與公界之間的對立。分析所謂男性中心與女性邊緣不是要顛覆邊緣與中心的位置，而是要辨別兩者之間的錯位。「男性中心」意欲擴展自己的秩序而排除「女性邊緣」，「女性邊緣」則尋找秩序的縫隙而威脅「男性中心」，這樣就產生了張力。

女性主義中的種族主義

很長時間以來，女性主義者提倡婦女之間的團結，即姐妹情誼（sisterhood）。姐妹情誼不被認為是革命的成果，而被認為是共同受壓迫的自然結果。這種姐妹情誼不顧種族、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差異。當時能夠意識到共同受壓迫的事實的人主要是持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觀點的資產階級白種婦女。早期的美國女性主義批評的主要問題是認同與種族主義，女性主義批評成為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的專利。抽

象的「姐妹情誼」掩蓋和神秘化了婦女的複雜社會現實的真正性質。實際上，我們應該分析婦女的具體的經濟、歷史和機構。世界上有許多婦女並不像第一世界的婦女那樣得到界定的，終日為衣食住行操勞的婦女並不關心作為一種哲學觀點的本質論，與小說和文學也沒有甚麼關係。西方社會改變性別歧視的作法也許對第三世界婦女毫無意義，甚至也許更加惡化第三世界婦女的處境。例如西方的許多學校在第三世界國家裏有投資，這種投資使西方的學校可以聘請婦女教授，召開關於女性主義的研討會，但是開會的大飯店裏多以低薪僱用第三世界的婦女當侍者。再如，電腦社會裏的金錢貨幣轉移只需按幾下鍵鈕，而電腦的部件往往是東南亞婦女長時間做着單調的焊接工作、出賣廉價勞動力的結果。西方投資所支持的跨國資本主義與當地的父權制勾結起來，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農工婦女的待遇每況愈下，日趨貧困。因此斯皮瓦克說，西方的女性主義者面臨的問題的焦點不僅是：「我是誰？」也應該是：「誰是另一個婦女？我應該如何稱呼她？她如何稱呼我？這是我討論的問題的一部分嗎？」（*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頁150。）

跨文化交流中的 「第三世界」形象的型塑

批判西方女性主義中的種族主義同時，斯皮瓦克又轉身批判所謂

「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s)。第一世界的婦女通過受到西方訓練的信息提供者來瞭解第三世界的婦女。跨文化交流的號召很容易受到在第一世界中地位上升的第三世界婦女的響應。這些婦女不去考慮地理的歷史構成，不去考慮世界(geo)是如何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被書寫的(graphy)，她們為了迎合第一世界讀者的需要而隨意把本土文化削足適履。對於第三世界的當地知識貴族來說，「跨」文化等於進入大都市的精英文化。他們的假定是「我能為他們(第一世界)做些甚麼？」，把「第三世界文化」變成了商品。誠然，斯皮瓦克的論點尖刻得令人難以接受，因為我們中間的許多人正是做文化交流工作的，然而認識到文化交流中的政治權力效用不會取消文化交流本身，只會揭示這項任務的困難之處。斯皮瓦克對自己也毫不留情。她經常被邀請發言，表達第三世界的觀點。她意識到當人一被用來裝飾門面，這個人在某些方面也就得被迫保持緘默。斯皮瓦克自己不大以「印度」為寫作對象，總是用引號把「印度」括起來。「印度」對於像她一樣長年僑居國外的印度知識分子來說，並不是使自己形成民族特徵的場所，「印度」同「歐洲」一樣是人造產物。如果一個人在美國談論歐洲特徵，很明顯他是用「歐洲」來反照美國，講「第三世界」或「亞洲」也是有針對性的，不會單純為敘述而敘述。斯皮瓦克指出，改變人們思維的模式是女性主義的目的，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任務。而意識形態批評者的問題在於她/他往往採取

「診斷」的立場，忘記自己也被夾在結構生產運作之中。

沒有純粹的立場，怎麼辦？

激進女性主義宣佈同父權制勢不兩立。但斯皮瓦克卻認為女性主義必須同菲勒斯中心結構進行協商談判，在現階段必須這樣做。斯皮瓦克本人晉升為匹茲堡大學的講座教授就是談判的結果。其實菲勒斯中心也在挪用女性主義：在大學中開設婦女研究課程，政府機構也討論改善婦女勞工待遇、婦女參政、家庭和教育等等的社會問題。如同沒有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或純粹的解構主義者一樣，也不存在純粹的女性主義者。如果我們說婦女使用的語言受到了性別歧視的污染，如果語法本身反映了男性思想，那麼婦女以現存語言說出或寫下的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是純粹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只能使用自己批判對象的語言，在某些方面淪陷為自己批評的犧牲品。但這並不等於應該放棄女性主義批評，相反，認識到任何立場均不可能毫無過咎之後，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立場。女性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分析人們習以為常的性別模式和文化思維方式，同時也警惕自己批評中的局限性和存在的問題。整個批評過程就是不斷地批評和反思的運動。

張京媛 1989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講師。